

从“混沌”到“明晰”：《遥远的向日葵地》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对生态话语的重构研究

袁佳怡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

摘要

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以人与自然之间混沌、流动、多义的生态话语为显著特征。在其英译本中，译者Christopher Payne通过系统的显化策略，将原文的生态混沌重构为逻辑清晰、主客分明的明晰关系。本文以显化策略为分析工具，考察Payne的译者主体性如何在非虚构文学翻译中重塑李娟的生态世界观。Payne的显化操作可归为三个层面：语言层面，让原文复杂的情感和隐含的逻辑变得清晰明确；文化层面，把原文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意象，明晰为主客对立的明晰图式；观念层面，人与自然的从需要体悟的混沌状态，变成确定的明晰状态。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原文中人与自然混沌交融的生态诗学，在译文中被重构为明晰的叙事框架。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生态话语在跨语际传播中所经历的文化调适与价值重构，为理解非虚构文学中生态话语的跨语际重构提供了典型样本。

关键词

《遥远的向日葵地》，显化理论，译者主体性，生态话语，明晰化

From Ambiguity to Clar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b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Jiayi Y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11,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Li Juan's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mbiguous, fluid, and polysemous ecological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hristopher Payne systematically employs explicitation strategies to transform the ecological ambiguity of the source text into a logically coherent framework with clear subject-object divisions. Taking explicitation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Payn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reshapes Li Juan's ecological worldview in non-fi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Payne's explicitation operations fall into three progressive dimension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the complex emotions and implicit logic of the source text are rendered explicit and unambiguous;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e imagery of harmonious integr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source text is transformed into a clear-cut subject-object opposition;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hifts from a state of ambiguity that requires reader interpretation to a state of clarity that is explicitly determined. Layer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onverge on a core argument: the ecopoetics of ambiguous human-nature integration embedded in the source text is reconstructed into an explicit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target text. This translational process manifest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hat Chinese ecological discourse undergoes during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offering a typical case for investigating the cross-linguistic reshaping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in non-fic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Explicitatio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Ecological Discourse, Clarif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以新疆阿勒泰地区戈壁耕种为背景，用质朴、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一家人在荒野中的生存经验。这部作品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也是李娟在英语世界传播较广的作品之一。2021年，Christopher Payne 的英译本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由英国 Sinoist Books 出版。

当前李娟作品英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冬牧场》译本的分析上，已有学者从非虚构翻译的“真实性”重构、概念隐喻构建、译者行为批评等角度切入。《遥远的向日葵地》英译的相关研究则较为有限，有少数成果从翻译美学视角加以关注。

李娟笔下的生态书写有一个显著特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混沌的。大地具有主体性，情感复杂多义，人与自然的边界并非清晰的对峙线，而是相互渗透的变动域。这种混沌性正是她生态诗学的魅力所在。有研究者指出，李娟的物叙事“主要通过动植物叙事与人造物叙事来完成”，是一种“深刻的生态智慧与文学实践”。她不仅是在书写自然，更是在邀请人们以自然的方式去思考和感知。这种书写方式在当代非虚构文学中独具一格[1]。

然而，英语散文传统倾向于清晰的逻辑、明确的情感标记和主客分明的叙述框架。当李娟笔下那种人与自然混沌交融的生态书写进入英语世界时，译者面临着根本性的选择：是保留原文的含混性，还是将其转化为英语读者更易理解的明晰结构？Payne 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这种含混性？他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怎样的译者主体性？这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以显化理论(Explicitation)为分析工具。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隐含信息予以明确表达的操作。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将显化限定为一种可观察的译者策略行为, 而非翻译的普遍特征。具体理论框架将在第二章详述。本文选取五个典型案例, 分析 Payne 如何将李娟笔下的生态含混重构为明晰关系, 并揭示这一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

2. 理论框架: 显化理论及其在生态话语分析中的适用性

显化概念由 Vinay 和 Darbelnet 于 1958 年提出, 后经 Blum-Kulka 发展为“显化假说”[2]。本文不试图验证显化是否为翻译的普遍特征, 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可观察的译者策略行为——当译者选择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含混的情感、模糊的关系予以明确化、逻辑化、清晰化时, 这一行为即为显化。这一界定将分析重心从“译文是否比原文更显化”转向“译者为何在此处选择显化”以及“这一选择重构了什么”。

为系统观察 Payne 的显化操作, 本文采用 Klaudy 的显化四分类框架: 强制性显化(语法必要)、非强制性显化(文体偏好)、语用显化(文化差异)和翻译内在显化(翻译过程固有倾向)[3]。结合本文的案例实际, Payne 的显化操作可归为三个递进层面。语言层面, 对应非强制性显化, 涉及情感与逻辑判断的明示; 文化层面, 对应语用显化, 涉及文化意象的置换; 观念层面, 对应翻译内在显化, 涉及原文世界观预设的系统性改写。三者构成从表层补全到深层重构的递进序列。以下将依次展开分析。

3. 案例分析: 显化策略下的生态话语重构

要理解译者 Christopher Payne 如何重构李娟笔下的生态话语, 最直接的方式是回到文本, 看他在具体的句子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以下从语言、文化、观念三个递进层面展开分析。这三个层面的划分依据 Klaudy 的显化分类——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与翻译内在显化——分别对应着 Payne 从表层词语补全到深层观念重构的介入轨迹。每个层面选取典型案例, 分析 Payne 如何将原文的生态混沌逐步明晰化。

3.1. 语言层面: 情感的锁定与逻辑的显化

本节的案例涉及 Klaudy 分类中的非强制性显化。Payne 在无需添加语法成分的情况下, 主动增补副词以固定原文的情感指向与逻辑判断。这种显化的操作对象是词语本身, 译者的介入方式是在原文的句子中嵌入新的成分, 使原文中未定的情感和隐含的逻辑被明确化。以下两个案例分别对应情感和逻辑两个维度。

3.1.1. 情感显化: 从多义含混到单一指向

原文: 在一片浩瀚的沙暴面前, 母亲叉腰大笑[4]。

译文: My mother stood laughing defiantly in the face of an immense sandstorm [5].

戈壁沙暴来临时, 母亲没有躲进地窝子, 而是站在风沙中叉腰大笑。原文只有一句话, 没有任何心理描写, 只给出一个动作。“大笑”在汉语中只是一个普通的表情动词, 但李娟不加任何修饰语。她相信情感的力量不需要依靠形容词来加持, 事实本身足够。这正是她写作的典型风格: 只呈现动作, 把对动作的理解完全留给读者。

这个“笑”到底包含了什么? 至少可以读出四层。第一层是蔑视, 面对恶劣环境, 笑中有“你奈何不了我”的姿态。第二层是荒诞, 人在浩瀚沙暴面前何其渺小, 笑声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解嘲。第三层是坚韧, 明知不可对抗却仍然站着, 笑是一种硬撑的方式。第四层是无奈, 除了笑还能怎样? 哭没有用, 跑也跑不掉。这四层情绪拧在一起, 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 根本说不清楚。李娟不做分辨, 把理解权完全交给读者。这正体现了李娟生态书写中情感态度的含混性, 她拒绝用形容词将自己和读者框定在单

一的情绪中,而是让情感在叙述中自然生长。对于这种情感表达的翻译,王岫庐曾提醒,非虚构文学翻译不同于虚构文学的“创造性叛逆”,译者需要更审慎地对待原文的情感真实性[6]。

Payne 的译文增加了一个副词“defiantly”。根据《牛津英语词典》,“defiant”指“公开反抗、挑战权威”。其词源可追溯至古法语 *defier* (挑战、不信服)。在英语文化语境中,这个词常与对压迫、困境的不屈搭配,带有某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色彩。加上了它,“笑”的性质就变了。原文的笑是向各个方向扩散的、不确定的,是多层次感受的集合。译文的“defiantly”把笑钉在了唯一的方向上,变成母亲对沙暴的示威。原文那四层并存的情绪被压缩为一层——反抗。荒诞感消失了,自我解嘲不见了,那种在苦涩中依然站着的坚韧,变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的“斗士姿态”。宋春艳认为 Payne 从“理性主义美学”视角出发,“在译文中加入了人的视角”[7]。此处“defiantly”正是这种加入的典型体现,把一个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自行体味的混沌情感,固定成了可以直接接收的明确态度。

从显化理论来看,这属于非强制性显化。因为“laughing in the face of a sandstorm”本身已经是完整的英语句子,不加任何副词也语法正确、语义完整。Payne 选择添加“defiantly”,不是出于语法需要,而是出于对情感走向的定向判断。杜思远、彭白羽认为生态话语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译者与原文生态观念之间的“对话”与“协商”[8]。Payne 在这里的“协商”结果是:把混沌的情绪压缩为单一的抗争叙事。他希望读者以“对抗”的框架来理解这个场景。他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了原文的开放性,用一个承载强烈意图的副词代替了原文那种未加限定的、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母亲的形象在原文里是一个在荒诞处境中沉默站立的人,她的笑凝聚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强度;在译文里,她变成了一个向自然示威的“反抗者”。

3.1.2. 逻辑显化:从隐晦暗示到显性判定

原文:但是第二天,她又早早地起来,举着铁盆在地里敲[4]。

译文: But the next day, she got up early again and futilely beat her basin in the field [5].

如果说“母亲的笑”涉及情感的明晰化,那么“敲铁盆”这一段则涉及逻辑判断的明晰化。要理解这句话的混沌性,不能只看这一个句子,必须回到前文。母亲之前说过这样的话:“算了,让它们吃吧,反正也赶不走。”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事实:她知道敲铁盆吓唬鹅喉羚是没有用的。

李娟在这里停住了。她不写“她无奈地敲”,也不写“尽管如此她还是敲”。她只写“敲”。读者从“知道没用”和“第二天又去”这两个事实的并置中,自己走完了从“无用”到“仍然做”之间的那段推理。这个结论不是作者塞给读者的,是读者自己拼出来的。她把意义生成的主动权交给读者,让读者在事实的缝隙中自己体味出荒诞、坚韧、无奈和幽默。

Payne 的译文加入了“futilely”这个副词,意思是“徒劳地、无效地”。读者不需要自己推导了,“futilely”直接把结论亮了出来:这是没有用的。这也属于非强制性显化,因为英语完全可以说“beat her basin”而不加任何副词。Payne 选择加上这个词,意味着他判断“无用”这个信息太重要了,不能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必须直接写出来。

然而,“futilely”不仅仅是描述,它还暗含评价。“徒劳”带有较强的否定色彩,隐含着“付出没有价值”的意味。它说“你做这件事没有结果”,同时还隐含着“做这件事没有意义”。原文中母亲的行为本身并不包含这一判断,判断是读者从“知道没用”和“仍然去做”的紧张关系中自己推导出来的。Payne 的译法把中间的推导过程整个省略了。胡淑华在探讨译者主体性时指出,译者的选择既受制于原文,也受制于目标语的文化规范和自身的价值立场[9]。Payne 这里的选择反映了英语写作的一种习惯:明确的判断总比模糊的暗示更好。母亲的形象在原文里是一个“在荒诞处境中仍然按本能坚守”的复杂存在,到了译文里,变成一个“明知没用还在做无用功”的悲剧人物。前者让你沉默,后者让你唏嘘。这是完全

不同的读者反应。

两个案例的共同特征是：Payne 用增补副词的方式，将原文中需要读者自行体味的情感与判断，直接写进了句子里。原文的含混由此变得明晰，但这种明晰是以牺牲原文的情感丰富性和解读开放性为代价的。

3.2. 文化层面：意象的置换与认知框架的重构

本节的案例涉及 Klaudy 分类中的语用显化。因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差异，译者用目标语读者更熟悉的认知图式替换了原文的文化意象。这种显化的操作对象不是单个词语，而是整个意象系统所嵌入的文化认知框架。相比语言层面的词语增补，文化层面的显化涉及的是一种更深层的转换，译者不仅在翻译一个词，而是在用一个文化体系的理解方式替换另一个文化体系的理解方式。

意象显化：从循环往复到线性对抗

原文：鹅喉羚一茬一茬地来吃葵花苗[4]。

译文：Goitered gazelles came in wave after wave to eat the sunflower seedlings [5].

“一茬一茬”原本是一个地道的汉语农业词汇。在原文语境下，“一茬一茬”不仅描述了鹅喉羚反复来袭的现象，也暗示了人的种植与动物的觅食共享同一个自然节奏。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茬”指农作物收割后留下的根茎，也引申为“批次、一拨”。它的原始语义场是庄稼、土地、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麦子收了一茬又一茬。在汉语文化中，“茬”不仅是一个计量单位，更承载着对农业循环的认知：种植、收获、再种植，人与土地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李娟把这个词用在鹅喉羚身上，造成了错位的修辞效果。

这种措辞的挪移至少制造了三层混沌。第一层，它暗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别扭的同步节奏：你种，它来吃；你再种，它再来。这种同步不是合作关系，却形成了一种宿命般的周期性，仿佛鹅喉羚的到来和庄稼的生长一样“自然”。第二层，它带来了黑色幽默。把灾害比喻成“一茬一茬”的作物，本身就带着冷嘲的意味——人用描述收获的词来描述损失，是一种苦涩的文字游戏。第三层，它模糊了“灾难”与“日常”的边界。鹅喉羚的来袭不再是戏剧性的突发事件，而是变成了戈壁生活里消解不了的背景音，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平常。胡庚申在讨论生态翻译学时曾提出“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译者需要适应包括语言、文化和交际在内的整体生态[10]。李娟的“一茬一茬”嵌入的是汉语农业文明的认知框架，因此 Payne 的任务不仅仅是翻译一个词，而是要把整个认知框架“转译”给英语读者。

Payne 译为“wave after wave”。“wave”的第一义是海浪，但在英语惯用法中，“wave after wave”最常见的搭配对象是军事进攻。例如，“wave after wave of enemy troops”、“wave after wave of attacks”都是高频表达。这种搭配习惯会激活英语读者脑中关于战争、入侵、攻击的图式。黄丽等认为李娟《冬牧场》的译者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往往会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做出权衡[11]。在这个案例中，Payne 显然选择了“务实”的一端，用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化图式替换了汉语农业文明特有的认知框架。

原文中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含混的、共谋的、彼此纠缠的关系——你种、我吃，咱俩谁也离不开谁——被译成了更清晰也更简单的“入侵-防御”二元叙事。原文的鹅喉羚像是在和人进行一种“共谋性”的互动，译文的鹅喉羚则像是训练有素的入侵者。“一茬一茬”的荒诞幽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符合英语读者预期的紧张对抗。Payne 在此处以明晰的对抗关系代替了含混的共生纠缠。

3.3. 观念层面：哲学根基的替换与世界观的改写

本节的案例涉及 Klaudy 分类中的翻译内在显化，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地将原文的哲学预设调

整得更符合目标语的认知习惯。这是三个层面中最深层的显化,因为操作对象不是词语也不是文化意象,而是原文最底层的观念架构。Payne 在这里的改写,触及的是李娟生态书写的哲学根基。

3.3.1. 哲学显化: 从行动抉择到情绪衡量

原文: 所谓“希望”, 就是付出努力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4]。

译文: What we call “hope”, “perseverance”... the energy and hard work we put into it... Perhaps it is stronger than complete despair... if only by a little bit[5].

前三个案例分别涉及情感、逻辑和意象的显化, 第四个案例涉及观念的跨语际重构。这句话出现在全书不多见的直接哲学表述中, 它被放在母亲一次次补种葵花、一次次被鹅喉羚啃食的叙事之后。当读者读到“所谓‘希望’……”时, 已经陪伴母亲走过了整个灾年的前半程。这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哲学命题, 而是从具体的劳动体验中生长出来的结论。李娟之所以能够用如此简练的语言重新定义“希望”, 恰恰因为她有前面两千多字的铺垫。Payne 在翻译这句话时, 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依赖上下文语境的哲学表述。

这里的“希望”与通常用法有偏差。一般语境里, “希望”指的是对未来有乐观预期, 或者觉得美好的结果是可能的。李娟把它重新定义为“做下去有可能比直接放弃强一点点”。“有可能”三个字非常关键, 暗示着努力不一定成功, 只是“可能”比不做强。这是一种很克制的希望观, 它拒绝浪漫化的承诺, 把希望拉回到脚踏实地的劳作经验里。周柳叶、陈芙提出李娟作品中的生态话语常常具有一种“混沌的张力”, 这种张力正是非虚构文学的诗学特征之一[12]。这里的张力在于: 希望既不是放弃, 也不是必胜, 而是悬在“做”与“不做”之间的那个微小差值。

Payne 的译文对这句话进行了系统的重写。比较原文和译文, 至少有三处重要的变化。

第一, 原文的“希望”是一个整体概念, Payne 把它拆成了“hope, perseverance...the energy and hard work”。这三个东西在原文里都是“希望”的组成部分, 但原文没有把它们拆出来当独立的词写。拆开以后, 原本浑然一体的观念被切割成了可以分开列举的几样品质, 这是显化中典型的“分析化”操作。

第二, 最关键的改动是把“完全放弃”译成了“complete despair”。“放弃”是一个行为, 即选择不做了。“绝望”是一种情绪, 即感到没有出路。李娟讨论的是行动层面的比较: 做比不做强。Payne 翻译的却是情绪层面的比较: 有希望比绝望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杜思远、彭白羽提出生态话语的翻译是译者与原文生态观念之间的“对话与协商”[8]。Payne 在这里的“协商”, 把行动哲学替换成了情绪哲学。这个替换在英语语境中非常自然。英语读者习惯于用情绪状态(希望 vs 绝望)来讨论这类问题, 而不太习惯用行为比较(做 vs 不做)。但这恰恰说明, Payne 不是在“忠实”地传递李娟的观念, 而是在用自己的文化预设重新解释“希望”。

第三, Payne 增加了三处省略号(...)。在英语书面语中, 省略号可以表示停顿、犹豫、思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些省略号在原文里是没有的。原文是确定性十足的陈述句, Payne 译出了一个带着思考迟疑效果的新句式, 叙述者不像是站在已经想好的结论上宣布“这就是希望”, 而像是边想边总结。两种语调完全不同。Blum-Kulka 的显化假说认为译文中衔接手段的显化程度往往高于原文[2], 但 Payne 这里的变化显然超越了“衔接手段”的范畴, 属于话语姿态的再定位, 他把一个来自劳动经验的确定性结论, 变成了一次带着试探性的个人推测。

三个改写的叠加效果是: 李娟的“行动哲学”被重组为“情绪哲学”。Payne 不是在翻译一个句子, 而是在用英语读者熟悉的概念框架重新解释李娟的生存智慧。希望的根基从“行动”转向了“情绪”的衡量。这一案例同时包含非强制性显化(拆解概念、添加省略号)和翻译内在显化(用情绪替换行动)。所谓翻译内在显化, 是 Klaudy 分类中最深层的一类, 指的不是语法或文化差异造成的显化, 而是翻译过程本

身固有的一种倾向，译者无意识中会把原文的世界观调整得更符合目标语的习惯。Payne 把“行动哲学”调整为“情绪哲学”，正是这种内在显化的表现。

3.3.2. 关系显化：从平等互依到单向依附

原文：什么都离不开水[4]。

译文：Nothing dared to leave it, or stay very far away from it [5].

这是五个案例中最短的一句话，但话越短，越容易看出译者的世界观预设。“离不开”是一个汉语习语，常见的用法是“谁也离不开谁”，描述的是两个人或两个事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它很中性，不暗示谁压制谁、谁害怕谁，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上的相互需要。在《遥远的向日葵地》的语境里，河水是戈壁里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万物都依赖它，这是叙事的基本预设。李娟说“什么都离不开水”，她只是在复述这个预设本身。这句话的张力恰恰在于它的平淡，它不是在强调什么，而是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Payne 的翻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关系设定：Nothing dared to leave it, or stay very far away from it. 他没有译“离不开”，而是译成“不敢离开”。“dared”是“dare”的过去式，意思是“敢于、胆敢”。“Nothing dared to leave it”字面意思是“没有任何东西敢于离开它”。这里发生了两个关键变化。第一，从“离不开”的事实陈述，变成了“不敢离开”的心理状态。第二，从“依赖”变成了“畏惧”。依赖是被动的自然关系，畏惧是主动的心理状态。依赖不涉及权力维度，畏惧则暗含权力不对等，谁被畏惧，谁就拥有支配地位。

如果把“dared”换成更直接的译法，比如“Nothing can leave it”或者“Everything depends on it”，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这两种译法的权力配置和原文差不多，没有上下关系，只有依赖关系。但 Payne 选的是带有畏惧感、带有等级感的“dared”。这不是无意识的措辞。Newmark 在讨论翻译与文本类型时指出，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间做出选择[13]。Payne 此处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他选择了一个更符合英语读者期待的主体化、意志化的自然图景，自然被赋予了近乎人格化的支配性力量。万物不是因为“需要”水而留在水边，是因为“不敢”离开它。宋春艳认为 Payne 从“理性主义美学”视角出发，“在译文中加入了人的视角”[7]。这一处恰恰相反，他没有加“人的视角”，但他加了“自然的意志”，这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在重构原文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力格局。Venuti 在讨论译者隐身时曾指出，译者的选择往往遮蔽了其对原文文化语境的改动[14]。Payne 在这里不仅没有隐身，还通过一个动词鲜明地改写了人与自然的支配关系。

这一案例属于翻译内在显化中最深层的一种。显化的不是某个词，不是某个意象，而是整个权力关系的预设。在面对一个表述中性、关系含混的句子时，他植入了一种明确的、英语读者更容易理解的权力叙事：自然是主导性存在，万物处于从属地位。原文中人与自然之间平等、相互依赖的关系，被改写成了自然主导、万物依附的关系。这是对李娟生态世界观的一次根本性置换，也是 Payne 译者主体性最集中的体现。

4. 结语

以上五个案例的显化操作可归为三个递进层面。语言层面，Payne 通过增补“defiantly”和“futilely”两个副词，将原文中未定的情感与隐含的逻辑判断直接写入译文，使原本需要读者自行体味的情绪和推理变得明确可知。文化层面，他用英语读者熟悉的军事认知图式替换了原文中汉语农业文化特有的“一茬一茬”意象，将人与自然之间循环共生的混沌关系置换为线性对抗的主客叙事。观念层面，他把“行动哲学”替换为“情绪哲学”，把“平等互依”替换为“单向依附”，触及的是李娟生态书写中最底层的哲学预设。三个层面逐层推进，从词语修补到认知框架替换，再到哲学根基的重置，共同指向一个核心

结论: Payne 将李娟原文中人与自然混沌交融的生态诗学, 翻译成了逻辑清晰、主客分明的明晰叙事。

这不是对 Payne 译文的否定, 而是对他译者主体性的一种描述。Payne 的每一次显化选择, 都是其在“忠实”与“可读性”之间做出的权衡。他倾向于把李娟笔下那些混沌的、需要读者慢慢沉淀的东西, 翻译成清晰的、可一次性理解的东西。Payne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 他的翻译带有学术译者的清晰化倾向, 他所理解的“好翻译”是让读者不费力地翻译, 而李娟的“好散文”往往是让读者在费力的阅读中体味复杂情感的散文。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

本文的分析表明, 非虚构文学中生态话语的跨语际传播,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两种生态世界观的相遇与协商。当一种生态话语离开它生长的语言土壤, 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时, 它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存活。Payne 的显化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协商过程的典型样本, 每一次明晰化都是对原文生态世界观的一次再定义, 而这种再定义本身, 恰恰揭示了翻译作为文化中介行为的复杂性与必然性。

参考文献

- [1] 张吉. 《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物叙事”[J]. 今古文创, 2026(14): 13-15.
- [2] Blum-Kulka, S. (1986)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90-305.
- [3] Klaudy, K. (1998) Explication. In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80-84.
- [4] 李娟. 遥远的向日葵地[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7.
- [5] Li, J. (2021)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Payne, C., Trans. Sinoist Books.
- [6] 王岫庐. “真实性”的重构——从李娟的非虚构写作及其英译谈起[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1): 179-186.
- [7] 宋春艳. 翻译美学视角下《遥远的向日葵地》英译的美学再现[J]. 肇庆学院学报, 2024, 45(6): 111-117.
- [8] 杜思远, 彭白羽. 李娟非虚构文学生态话语英译的修辞对话路径探析[J]. 长江小说鉴赏, 2025(12): 74-77.
- [9] 胡淑华. 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 2007.
- [1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J]. 上海翻译, 2009(2): 3-8.
- [11] 黄丽, 徐梓娟, 孙博楠, 等. 中国民族文学外译译者行为研究——以李娟《冬牧场》英译本为例[J]. 名家名作, 2025(1): 88-90.
- [12] 周柳叶, 陈芙. 《冬牧场》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英语广场, 2025(23): 20-23.
- [13]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Hall, 292.
- [14]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353.